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多元化聖經批評的當代景觀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ang, Gong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7 11:41:35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48">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48</a>

## 多元化圣经批评的当代景观\*

梁 工

**内容提要:**后现代主义哲学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大力倡导多元论,推动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相继登场,为圣经学者提供了可资一试身手的多种批评工具。这使当代圣经研究发生了从历史批评向文学批评的范式转型,具体表现为:从历史过程转向文本自身,从浅层心理转向深层心理,从作者意图转向读者接受,从封闭思辨转向文化批判,从单一阅读转向综合解析。当代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关系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外经学之间的对话,在跨越性考察中发现古代经典的新颖含义,激励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圣经批评,最终构建起中国自身的经学研究理论体系。

**关键词:**圣经批评;文学理论;多元论;经学对话

---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关系研究”(项目号07BZW004)的阶段性成果。

## Contemporary Scenery of Multi-Biblical Criticisms

LIANG Gong

**Abstract:** Postmodern philosophy promotes pluralism forcefully in the aspects of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and axiology. It pushes forward various literary theories which provide many kinds of critical methods for biblical critics. This leads to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from historical to literary criticism in modern biblical study realm, which embodies in *transforming from historical process to text itself, superficial mentality to deep psychology, author's intention to reader's reception, closed analysis to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ingle reading to synthesized hermeneutics.* A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multi-literary theories and biblical criticisms is beneficial to advance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research. It is also beneficial to probe new meanings of ancient classics in cross-investigation, encouraging Chinese scholars to draw lessons from western biblical criticism, so as to establish a Chinese classics theory system.

**Key words:** Biblical Criticism; literary theory; pluralism; dialogues of classics

圣经具有多重性质,兼为古代犹太民族和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典籍、史学典籍和文学典籍。这三重品质导致通向圣经的三条路径,一如勒兰德·莱肯所说:对圣经“能从不同视野、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神学路径主要关注某个段落中的道德神学观念;历史路径主要关注圣经作者笔下的实际人物和事件;文学路径则聚焦于文本的特色、文本基于感性经验的具象性、对各种文体的运用、素材得以

表现的艺术性,以及文学的语言手段。”<sup>①</sup>在圣经学术史上,这三条研究路径既错综交织,又各有其辉煌繁盛之时——18世纪中期之前神学阐释居于主导位置;嗣后,在启蒙时代的文化氛围中,圣经批评家逐渐习惯于规避或悬置信仰,而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出发,对涉及圣经文本的各种议题做出历史学及社会学的评述;及至20世纪中期前后,由于受到多元化文学理论蓬勃发展的影响,圣经批评的总体格局再度发生深刻转型,进入一个文学批评的新阶段。

## 一、当代多元化圣经批评局面的形成

当代圣经批评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究其原因,乃在于多元文论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全面拓展和有力深化。至于当代文论能出现多元化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现代哲学对“多元论”的推崇。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以多元论为显著特征而标榜于西方哲学大厦中的。它把多元论推崇到了极尊地位,在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各个方面都大加倡导。就认识论而言,近现代哲学体系建立在基于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则反对那种二分法,认为它导致了逻辑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多方面流露出理性主义文化的专制性特征。区别于近现代哲学关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论述对象转换成统一了主体与客体的“文本”,主张“文本”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人所涉及的一切都存在于“文本的世界”中,一如德里达所言:“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一无所有。”<sup>②</sup>文本在读者的理解中生成,不

---

① Leland Ryken,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87, 14.

②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158.

同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千差万别,从而导致意义的多样性和歧异性。换言之,当后现代主义哲学将文本置于理解活动中的阐释状态时,必然赋予它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对性和多元性。

在方法论方面,近现代哲学遵循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对事物采取静态的结构分析;后现代主义哲学则运用阐释学的描述方式,对事物采取动态的历史分析。作为一种知识建构方式,对“多维时空中的事物进行动态说明”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运思的基本特征。这批哲学家既把文本理解成一种开放性的历史结构,也把理解本身视为文本在历史中生成的根本路径。伽达默尔强调理解和文本生成都有永无止境的性质,称理解是一种文本的自我衍生,是在整体与局部的“循环性阐释”中逐步实现的,而文本能得以重建,则是由于理解达到了“历史视域”与“现实视域”的融合。<sup>①</sup>既然在历史性的多维时空中观察和认知对象,所感知和理解的意义必定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就价值取向而论,近现代哲学因惯于排斥异己而带有专制主义性质,后现代主义哲学则秉持开放性思维,崇尚以宽容心态和平等理念对待所有事物和一切文化。它承认世间万物都处于生成转化过程中,无论客观物质、主体意识抑或知识文本都是多元呈现的;无论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及其关系,抑或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都具有多元情状。基于这种认识,这批哲学家主张一切知识都是平等的,不存在权威与非权威之分;不同知识之间的沟通形成“对话”,“对话”并非以一种观点压制另一种观点,而是双方在彼此相见、相识、相知的基础上达成某种“视域融合”。<sup>②</sup>这种价值观能确保各种“小型叙事”对“宏大叙事”的取代,使形态各异

---

① 伽达默尔:《诠释学 I,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5—418页。

② 王治河:《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向度》,《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的经验和知识得以多元化地呈现出来。<sup>①</sup>

正是在这种日益浓重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氛围中,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学理论相继登场,为圣经学者提供了多种可资一试身手的批评工具。就文论家所持认知方式的差异而言,当代文论能分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类型,前者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符号学,以及社会历史批评、作家传记批评等,其共同特征在于主张文学批评是“发现作品固有性质和价值的科学性工作”,“不容许批评者带有丝毫偏见,无论它们来自何处,来自批评者本身或是社会”。<sup>②</sup>后者能举出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等,这些批评派别无意于恪守“唯一客观”标准,而是强调阅读主体的历史性、能动性、情感性、创造性、差异性,表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致使“意义”的标准成为一条变动不居的曲线,抑或航道曲折的河流。

上述文论模式无一例外地涌入当代圣经批评领域。数十年间,圣经学者的创新追求大致重复着一个类似的程序:几个具有冒险精神或拓荒热情的人首先在地区性或全国性圣经学术会议上宣读标新立异的论文,其后那些论文被《赛迈亚》(*Semeia*)一类鼓励创新性实验的学术期刊发表,或汇编成文集出版,成为某种新潮理论渗入圣经研究界的书面文字信号。一般说来,新潮理论往往初兴于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或人类学领域,继而被引进文学和比较文学界,再后才被圣经学者所采纳。某种理论从诞生到运用于圣经批评,一般需要五至二十年。

由于具备鲜明的反传统性质,那些“新式”圣经解读常常命运

---

① 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1991, 29-30.

② 郭宏安等编:《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

坎坷,不为主流圣经学者所认同,因为后者对“规范”、“正统”的圣经解读模式早已形成定见。然而那些志在创新的学者则无惧阻力,要么忽略、要么抵制来自学术权威的挑战,而继续从事其业已开始的实验。一段时期之后,他们会组建一个由志同道合者构成的核心机构,继而在专业性学术会议上建立自己的团体,并将新潮理论用于更为广泛深入的圣经解读,以便扩大影响,吸引更多受众。平心而论,他们的某些解读起初并不尽如人意,而显得牵强附会或生硬武断,但另一些解读却可能闪烁出耀眼的光芒,给人以新奇的惊喜,甚至令人击案叫绝。稍后,一些新兴路径会逐渐得到认可,显示出相当强劲的生命力,以致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加入该派行列,在专业会议上宣读论文,在专门期刊上发表文章,并接连出版专著或论文集。由于秉持那种新兴理论的特定研究在圣经学术史上尚属空白,该派学者也许会利用这种有利时机,对圣经正典中的每部经卷乃至每个章节都做出“不留死角”的“全面扫荡”。社会学批评家、女性主义批评家和后殖民批评家便从事过这类成功尝试,分别出版了大部头的专题性圣经评论著作。

此类新潮研究往往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约略二十年就具备较大规模,不再是当初的“新方法”,而汇入当代圣经批评主流。其实,并非所有读者甚至研究者都熟悉那种理论、方法及其哺育的成果,常见情形是,该派的学术地位主要是在“圣经文学学会”每年一度的年会(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s Annual Meeting)上确立的。圣经文学学会的常设机构虽然轮流设置于美国的一些大学,但其一万多名会员的国籍却远远突破美国而遍及世界各地。所以,传播于圣经文学学会上的声音有可能形成普遍的国际性影响。当某种方法逐渐司空见惯而被广泛认同之际,另一种新方法又会脱颖而出,进入人们的视野,开始其从遭到怀疑、抑制到逐步被认可和接受的循环。

由于上述景观发生于西方后现代主义酝酿、形成、流行并产

生普遍影响的文化语境中,当代圣经批评又得名“后现代圣经批评”。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一些鬓发斑白的学术顾问习惯于严肃地摇着头,奉劝其年轻同事:染指于后现代主义无异于在业务上自尽。然而时至20与21世纪之交,虽然不少人仍感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威胁,但整体观之,局面已发生根本性改观:一批正面评介“后现代圣经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sup>①</sup>,种种指责、干涉这类研究的势力渐趋萎缩,持此选题的研究生不再惶恐于其论文难以通过答辩,一些专长于这类课题的学者也获得终身教职,甚至坐上荣耀的学术交椅。

## 二、20世纪中后期圣经研究的范式转型

漫长的圣经研究史上发生过两次全局性的范式转移,第一次时值18世纪中后期,特点是从张扬信仰的神学阐释转向基于理性主义的历史批评;第二次则在20世纪中后期,特点是从历史批评转向文学批评。此后,多数研究者无意于探讨圣经中的历史元素或圣经成书史,而把圣经当成一部用特定语言写成的文学文本,尝试以种种新兴文论揭示出其承载的文化寓涵。析言之,这次从历史批评向文学批评的转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历史过程转向文本自身,从浅层心理转向深层心理,从作者意图转向读者接受,从封闭思辨转向文化批判,从单一阅读转向综合解析。

### (一) 从历史过程转向文本自身

历史批评所关注的主要是圣经成书的历史过程,其具体运作往往离不开对圣经文本的肢解。例如,格拉夫—威尔豪森等人的

---

<sup>①</sup> 例如,David Jobling et al. eds., *The postmodern Bible reader*.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01. George Aichele et al. eds., *The Postmodern Bib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A.K.M. Adam ed., *Post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ible: A Reader*. St. Louis: Chalice Press, 2001.

“底本学说”将统一的摩西五经分割成J、E、D、P四种原始文献,以揭示五经的早期面貌;袞克尔等人的“形式批评”着眼于辨析圣经文本的较小类型单元,以求发现那些单元形成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口传文学的某些形式特征;康泽曼、马克森等人的“编修批评”为了寻索圣经编订者的独特意念,亦须拆解文本,从字里行间搜寻所需的点滴材料。由于可资依据的文本线索极其有限,他们的做法难免带有较多主观臆测性,且不易为后世读者所驾驭——因为读者能看到的是圣经的最终文本,而非“据推测”其成书前某个阶段的“未定稿”形态,甚至更为远古的口传形态。鉴此,当代圣经文学批评家不再纠缠于历史背景和成书过程,不再肢解文本,而把圣经文本的最终形式或传世样态当作考察对象。他们从事圣经文类批评、修辞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专题探讨时,都明确回避历史背景,而聚焦于语言学方面的议题。

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从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的《模仿论:西方文学所描绘的现实》(1946)谈起。该书远离历史考据而返回文本自身,开篇伊始就将荷马史诗《奥德赛》对俄底修斯十年漂泊后回到家中的描写与《创世记》中亚伯拉罕燔祭献子的场面进行比较,揭示出圣经叙事的简约、含蕴风格。1982年大卫·罗斯和多纳德·米琪合著《作为故事的〈马可福音〉》,表明只有把《马可福音》读为是一部连贯的叙事,才能体会到它的艺术魅力。在此前后,金斯伯利、库普伯、坦尼希尔分别发表对另外三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进行叙事学批评的著作,巴伊弗拉特、罗伯特·奥特、梅厄·斯腾伯格等则推出研究希伯来圣经叙事艺术的专著,侧重于通过文本细读揭示圣经的文学品质。

且以罗伯特·奥特的《圣经的叙事艺术》(1981)为例,观察当代学者对圣经文本的内部研究。在奥特看来,圣经是神学、史学和文学的统一体,其神学观念和史学内容皆须借助于语言手段和

文学技巧才能表达：“圣经的视野正是透过散文体小说的各种最精巧的手法来传达，才增加了深度和微妙程度。”<sup>①</sup>他将其解读对象限定于文本中的字词、情节、对话和叙述四大类，逐一予以细致入微的剖析。例如“对话”，他认为圣经叙事者擅长以对话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角色之间的交流常常经由对话展开，叙述者的插叙较为鲜见。大致说来，如果某件事比较重要，作者会用对话而非概述来表达，以致从概述到对话的过渡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表明作者对所述事件重要性的评估。圣经作者常用对比手法（如简短与冗长、概略与详尽等）组织对话，并通过调节人物的谈吐方式（如语气之缓急、风格之雅俗、内容之详略等）实现对角色特征及人物关系的描述。<sup>②</sup>

当代资深学者勒兰德·莱肯的圣经文学研究建立在从亚里士多德到英美新批评的文论传统基础上。他相信古往今来的文学名著具有可被证明的同一性，因为文学主题或内容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人生的经验。其意义体现于多样化的文本形式和文体中，读者或批评家的首要任务乃是与文本的形式彼此交流互动。叙事、诗歌之类文学形式既是承载意义的媒介，也是作品艺术性和文学技巧的证明。对形式和技巧的研究要求细读文本，不仅细读单篇作品，还要遍读某类想象性文学的所有作品。<sup>③</sup>

伯维尔论及文学文本批评与历史过程研究的不同特征，认为前者着眼于探讨圣经的诗性功能，后者则瞩目于其资料功能。文学文本批评意味着“文学批评家能摆脱对文本反映现实真实程度的思考，而进入一个审美境界，专注于对其所述故事艺术的鉴赏；

① 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45.

② Ibid., 178-185.

③ 参见梁工：《勒兰德·莱肯》，《圣经文学研究》第1辑，第369—372页。莱肯的下列著作已经译为中文：《圣经文学》，徐钟、刘振江、杨平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认识圣经文学》，李一为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圣经文学导论》，黄宗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要用审美目光观察或参与故事的世界,而非用历史术语评判那个世界”<sup>①</sup>。例如,对于圣经故事中神迹奇事一类超自然描写,历史考据学者通常会提出疑问,因为他们以“资料功能”的强弱衡量对象,而资料功能是文字材料表现合于自然法则的真实世界的性能。文学批评者对此却不会困惑,而是一视同仁地看待各种故事成分,兴趣在于研究不同成分对故事系统所发生的作用,及其对读者接受所造成的影响。

## (二) 从表层心理转向深层心理

历史批评的基本前提是有意无意地悬置信仰,将圣经理解为一部人的作品,记录了古代以色列人及早期基督徒的历史生活;进而考察圣经的编著者、成书背景、受众身份,及其书写和编订的历史过程。这种研究难免涉及圣经文本内部及其成书过程中的心理学问题,因为圣经所述人物,其作者、编者和受众本来就有生动而丰富的精神生活,那种生活还涉及意识和无意识的不同层次。由此,近现代圣经研究在所难免地论及社会历史背后的人类心理世界,贝克的《圣经心理学纲要》(1843)、豪斯曼的《圣经心理学引论》(1848)、德里茨的《圣经心理学体系》(1861)、弗莱彻的《〈新约〉心理学》(1912)、霍尔的《心理学光照下的耶稣基督》(1917)等便是这方面的早期成果。但因当时心理科学尚处于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批著作对圣经文本内外各种心理现象的揭示均相对肤浅,仅触及意识的表层,远未探入精神世界的无意识深处。

20世纪上半叶,以弗洛伊德和荣格学说为代表的深层心理学渗入圣经研究界,首先被训练有素的精神病医师和牧师用于讲解圣经,疏导信徒克服其心理障碍,继而被学者用于剖析经文,从无意识层面对圣经进行深度透析。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1938)体现出其精神分析理论对圣经阐释的直接影响,表现为一

---

<sup>①</sup> See M. A. Powell, *What is Narrative Criticism?*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0, 9-10.

种对被压抑之隐含意义所做的心理分析,那种意义潜藏在出埃及叙事的情节和象征意象中。就研究者所接纳的分析工具而言,更为重要的还是弗洛伊德那些有关无意识的一般理论,及其用来处理实际病例的精神分析洞察力。

较之弗洛伊德,荣格与圣经的关系更紧密也更复杂,他论及多部圣经卷籍和多个圣经人物,称圣经文本是一种“心灵的声音”,浓缩了人类的精神史或心灵史,在那部历史中,无意识元素像意识元素一样发挥着作用,其功能在于补足或纠正意识活动的片面性。荣格主张用“放大”和“积极想象”进行深层心理现象阐释,“放大”能为圣经阅读提供更宽广的视界,使读者跳出神学、文学、历史的窠臼,从比较神话学、比较民俗学等角度进行远为宽泛而新颖的观察。“积极想象”则提醒圣经阐释者:“文本的真理能以多种形式表达……每种形式都代表不同角度,每种角度都能使人发现独特的寓意。”<sup>①</sup>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研究表明,对圣经的深层心理批评聚焦于文本触及人类内心世界时所显示出的价值,并考察那些价值对文明进步的意义,能极大地弥补历史批评的不足,有效地拓展和丰富文学批评的论域。

受弗洛伊德和荣格影响,从不同角度对圣经进行心理学及精神分析批评的论著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泰森的《保罗神学的心理学面面观》(1987)、埃伦斯等主编的四卷本《心理学与圣经:阅读圣经的新途径》(2004)——该书第一卷对学者们用于圣经批评的十余种心理学理论逐一剖析,第二、三、四卷对数十个圣经专题尤其耶稣的心理传记做出翔实透彻的个案分析。早在1994年,一份由教皇考察团发布的调查报告就已认定,“心理学与精神分析”已成为当代十五种重要的圣经研究路径之一。<sup>②</sup>

① Wayne G. Rollins, *Jung and the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9, 104.

② J. Fitzmy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n the Church*. Rome: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1994, 51-52.

与心理学—精神分析批评关系密切的当代圣经研究路径还有“神话—原型批评”，代表人物是诺斯洛普·弗莱，其学术范式受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和原型批评，以及启蒙时代以来多种神话理论的影响。弗莱建构其理论体系本身就是一次卓越的圣经神话批评实践，他曾说，其所有批评著作“都是围绕着圣经的”<sup>①</sup>，而“圣经中一切与‘真理’一词相联系的价值观，只能通过神话和隐喻才能获得”<sup>②</sup>。他把“经典神话”称为“未移位神话”，谓圣经是“我们传统中未移位神话的主要来源”。<sup>③</sup>

### （三）从作者意图转向读者接受

在历史批评居主导地位的近现代，文本意义的“标准答案”往往与“作家意图”相联系，理解作品的关键被系于作家研究。欲知某卷先知书的含义，须首先了解那位先知的生平思想；欲读懂某卷使徒书信，须先行搞清楚该使徒的观念和追求。在“来源批评”那里，J作者出身于南方犹大支派，E作者是北方以法莲人，D作者是公元前621年左右的申命派史家，P作者是亡国以后的祭司派文士；他们皆出于特定意图而著书立说。“编修批评”强调，只有首先了解每位福音书作者的独特思想，才能对其著作的特殊贡献予以深度评说。然而圣经作者的真实身份及其著书意图难以确考——这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一味突显作者意图的主导作用，势必阻塞读者对文本进行多样性阐释的道路。鉴此，一些当代文论派别（诸如阐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解构主义等）力倡从作者中心转向读者中心，声称意义寓于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

---

① 诺斯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郝振益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 诺斯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5页。

③ 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99页。

中,甚至完全来自读者的认知体验。

阐释学与圣经研究交织互动的历史已达两千年。为使圣经的语词、句子、叙事、隐喻及其负载的理念能为后人无障碍地理解和接受,一代代犹太拉比及基督教解经家殚精竭虑地从事释经活动,构建出体制庞大、精细复杂的圣经阐释系统。在圣经阐释学趋于完备的过程中,一种适用于阅读所有文本的文本阐释学,进而是一般阐释学悄然形成,开辟了通向哲学阐释学的道路。近代以来,施莱尔马赫努力摆脱圣经阐释学的成规,将一般阐释学引入哲学阐释学的轨道,继之,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等使哲学阐释学逐步获得相对完整的当代形态。哲学阐释学一经形成,又为圣经阐释学注入新鲜活力,在当代圣经批评领域展示出一派别样景观。

大卫·特雷西认同圣经阐释的多元化和处境化,相信阐释的路径虽然多种多样,最终焦点却皆在于当下问题。圣经的意义取决于理解和解释,阐释学能为多元文化处境中的理解和阐释提供行之有效的工具;反过来,作为宗教文化大典的圣经凝聚了纷繁复杂的人类经验,又能有力地验证阐释学原理和方法的适用性。特雷西在《洞察力:对人类理解的研究》中着重探索了方法论,显示出伽达默尔和利科的跨学科视野,及其对人类理解之先在条件和历史过程的精细辨识。他赞成布斯(W. Booth)提出的“相对充分”标准,同意“对经文进行清晰的批判性认识”和“多元解读”,以求实现对文本多重意义的最佳理解<sup>①</sup>;亦即用批判的目光判断各种潜在意义的相对优劣,从中择善而用之。

读者接受理论特别强调读者身份及其处境的复杂多样性。仅以“后殖民读者”为例,其中便包括殖民地的本土读者、身为反

① David Tracy, "Reflections on John Dominic Crossan's Crossan's Cliffs of Fall", *Seminar Papers of SBL*. Chico, California: Scholars Press, 1980, 74.

殖战士的读者,以及有过被移民经历的读者,其身份涉及拉丁美洲及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大屠杀后的犹太幸存者、各种政治避难者、背井离乡的劳工,以及在西方国家谋生的第三世界国民。其圣经释读因人而宜,但都反映出各自遭遇的殖民压迫,体现出他们对殖民强权作斗争的独特方式。在艺术领域,非洲裔美国黑人艺术家反对殖民主义画家将耶稣、马利亚描绘成白皮肤、蓝眼睛、金头发的欧洲白人模样,而将其塑造成黑人形象,以此迈开反殖民斗争的步伐。

从事读者反应批评时,亦有人着眼于文学技巧,揭示圣经的叙事、论说和抒情艺术在读者接受过程中的作用,如伍尔纳的《〈罗马书〉中保罗论辩的修辞学》(1977)<sup>①</sup>、彼得森的《再现保罗:〈腓立门书〉与保罗所述世界的社会学》(1985)<sup>②</sup>等。他们将圣经文本视为一个实体,以多种文学手段写成,其中一些技巧特别为当代读者反应批评家所鉴赏,例如作者对“空白”和“游移视点”的运用。

#### (四) 从封闭思辨转向文化批判

从古代神学阐释、近现代史学考据到当代一些流派的文学评论,圣经研究大体上属于“象牙塔学问”,研究者惯于从事封闭式的学术思辨,只围着圣经潜心钻研,而远离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斗争。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圣经学者中亦涌现出不少关怀现实政治、热心于文化批判甚至兼为社会活动家的人,他们强调理论改造社会的实践功能,将批评活动与外部世界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冲突相联系,使书斋里的研究得以融会于弱势群体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比如,罗兰·波尔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

① W. Wuellner, "Paul's Rhetoric of Argumentation in Romans", in *The Romans Debate*. ed. K. P. Donfri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77, 252-274.

② N. R. Petersen, *Rediscovering Paul: Philemon and the Sociology of Paul's Narrative World*.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5.

论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解读《创世记》<sup>①</sup>,用葛兰西对马基雅维里的评论剖析摩西严惩拜金饕者事件<sup>②</sup>,便彰显出意识形态批评的斗争锋芒。

传统的圣经研究倡导“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但当代批评家认为,这种貌似公允的态度是根本行不通的。追求所谓“超然的客观性”(detached objectivity),要么是在叨念天真的神话呓语,要么是在流露懦弱的主体意志。“圣经学者若非与他人一同寻求完全的平等、人权,为无论性别、种族、国籍的全人类争取一种富有尊严的生活,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与世界上那些不人道的、压制人的、奉行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势力沆瀣一气。”<sup>③</sup>

20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圣经阐释蔚然成风,菲利斯·特丽波论及这种阐释的三条进路:其一,审视圣经中歧视妇女的个案,揭示古代以色列妇女的自卑、顺服和遭受凌辱;其二,借助于强调被忽视的文本、重释熟悉的文本,辨识出某些圣经片断对父权制的批判;其三,重述并阐释圣经中妇女被迫害的恐怖故事,挑战其中的父权制观念。<sup>④</sup>概观之,女性主义圣经阐释既使圣经的男性中心主义性质显露无遗,也揭示出其中一些篇章某种程度上的男女平等意识。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解放神学发展出一套经验先于理论、行动重于思辨的释经模式,出发点是第三世界民众的切身经历:贫穷、饥饿、营养不良、基本人权难得保障,缺乏最起码的饮食、安居、医疗和受教育条件。该派释经者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

---

① Roland Boer, "Louis Althusser: The Difficult Birth of Israel in Genesis", in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14-41.

② Roland Boer, "Antonio Gramsci: The Emergence of the 'Prince' in Exodus", in *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42-64.

③ 威廉·克莱因等著:《基道释经手册》,蔡锦图主编,尹妙珍等译,香港:基道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④ 菲利斯·特丽波:《女性主义诠释学与圣经研究》,周辉译,《圣经文学研究》第3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5—44页。

圣经叙事津津乐道,认为那场被压迫者反抗帝国强权而获得解放的变革是一个证据,表明上帝是站在穷苦人一边的;耶稣反复宣讲的上帝之国本是一个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充分保障穷苦人权益的国度。

后殖民圣经批评的早期形态是一种抗拒性写作,表达了对帝国主义道德的拒斥;继而成为一种分析工具,被各种流散学者和移民学者用于圣经学术活动。<sup>①</sup>他们积极探讨后殖民圣经批评理论,多方面揭露殖民者圣经阐释与殖民主义的共谋性立场,深入透视古今帝国与圣经正典生成及阐释的关系,努力谋求边缘话语获得主体性地位,并聚焦于对待帝国的态度,对一批早有定论的圣经卷籍做出新颖的再评价。

1967年林恩·怀特发表论文《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sup>②</sup>,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追溯到《创世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生态批评学者认为,希伯来圣经中固然含有一些生态保护思想,它却是在神学架构中表述其生态理念的,以致自然界只能在一部“人犯罪、神拯救”的宏大叙事中充当陪衬者角色,以其自身证明上帝创造万物的全能,还要每每充当上帝惩罚罪人的工具。当代神学家在圣经生态批评的基础上重识“上帝一人一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承认大自然的神圣性,倡导人与自然相互尊重、友好共处,将生态神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绿色运动向纵深推进贡献出重要的观念支撑。

### (五) 从单一阅读转向综合剖析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圣经被赋予“至尊圣典”的崇高

---

① R. S. Sugirtharajah, "Charting the Aftermath: A Review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in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6.

② 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地位,释经学成为卓尔不群的学问,拥有自成体系的学科构成、研究性质、操作范式和功能效用,为其他任何“凡俗之学”所无法比拟也难以企及。近现代历史批评虽然拆除了圣经与其他知识文本之间的藩篱,却依然持守曲高和寡的“圣经学”领地,在其中环绕着单一的圣经本身耕耘收获,而缺乏自觉明确的综合、跨越或比较研究意识。但20世纪上半叶以降,比较文学渐成显学,为圣经批评提供了进行综合性考量的新思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圣经置于多种民族、语言、文化的文本之间,或追踪它们彼此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或权衡它们在平行对比中呈现出的价值,或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神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的广阔视域中对圣经进行跨学科辨析,这些研究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对圣经的认知。

圣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研究者乐于谈论的话题,他们对这类议题的关注甚至超越对圣经本身的文学分析,谢大卫主编的皇皇巨著《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词典》(1992)即一个成功范例。圣经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现代文学课堂,原因之一在于它是西方文学“最伟大的源头”<sup>①</sup>,对文学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部著作”<sup>②</sup>——当批评家们发表这类论述时,所针对的不仅是文学中俯拾可见的基督教元素,还是一种文学直接受惠于圣经的事实。刘易斯(C. S. Lewis)区别了“作为文学源泉的圣经”与“作为文学影响力的圣经”,认为圣经以这两种方式持续不断地存活于西方文学中,“源泉为我们提供了可供书写的事物,影响力则激励我们以某种既定方式书写”。<sup>③</sup>

① T. R. Henn,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58.

② 诺斯洛普·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③ C. S. Lewis, *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the Authorized Vers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67, 15.

在文学史上,刨根探源,圣经多方面接受前代文学的滋养而成长起来;寻流察变,它成书后对后世西方文学发生了一言难尽的影响,几乎惠及所有名家名作。这使研究者考察此类作家作品时,就像“穿行于一条硕果累累的双行道:一方面,对圣经原型的熟悉能提供一种语境,丰富人们对所读文学中原型模式的经验,例如当人们意识到匹普的道德之旅追随了浪子回头的母题时,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不少描写就有了归属之地;另一方面,人们不断增长的对于文学原型的经验,又能越来越多地打开通向圣经本身的门户和视窗”。<sup>①</sup>

圣经于唐、元、明、清时期数度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尤其19世纪中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哲学、伦理和文学艺术发生了多种影响,这导致一个涉及中国文化的比较文学课题,即对圣经与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相关成果可举出路易斯·罗宾逊的《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sup>②</sup>、艾伦·伊伯等的《圣经在现代中国》<sup>③</sup>、罗曼·迈勒克主编的《耶稣基督的中国面孔》<sup>④</sup>等,以及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的大量论述。

在圣经的跨文本研究领域,“经文辨读”(即对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经典文本的比较性研究)包含着深刻的批判精神,被视为当今宗教对话和人文学思考的共同基础。杨慧林认为,对于中国学人而言,真正有价值的“经文辨读”应当发生于圣经与中国经典之

---

① 勒兰德·莱肯:《圣经与文学研究》,梁工译,《圣经文学研究》第1辑,第14页。

② 路易斯·罗宾逊:《两刃之剑:基督教与20世纪中国小说》,傅光明、梁刚译,台北:业强出版社,1992年。

③ Irene Eber, Sze-kar Wan & Kunt Walf eds., *The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该书中译本名《圣经与近代中国》,伊爱莲等著,蔡锦图编译,香港: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3年。

④ Roman Malek ed., *The Chinese Face of Jesus Christ*. 4 vols.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 China - Zentrum, 2002-2006.

间。他带领一个团队以19世纪来华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的中国经典西译为典型个案展开研究,取得了开拓性成绩。<sup>①</sup>

任何宏大叙事都信奉独一无二的参照系,认为只要找到一个上帝般的全知视角,就能确保事实的准确和阐释的正确。然而在当代学者看来,根本不存在那种绝对事物,只有依据自身经验行事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其“真理标准”,只是那种标准仅仅适用于本群体内部。由于认同多种参照系的存在,主张以相互对立的方式解释同一事件或文本,当代学者必然承认释义之间的差异和对立。<sup>②</sup>当代圣经批评之所以纷繁复杂而并行不悖,其学理依据之一即在于此。

### 三、推动中外经学对话,促进经学比较研究

笔者寄希望于当代多元文论与圣经批评的关系研究能提供一个范例,表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原本是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进而,这项研究还有助于人们积极运用多元文论,从不同角度剖析、理解和鉴赏古往今来的各类文学作品。按照19世纪的“纯文学”概念,唯独小说、诗歌、戏剧算得上文学,适合充当文学批评的对象。但在20世纪下半叶,更多书写样式被认同为文学,诸如日记、传记、布道文、政治讲演录、古代文化典籍等;而文论关注的议题也跨越以往的边界,遍及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建筑、音乐、美术、电影、广告、网络传媒等宽泛的领域。显然,多元文论适合引导人们以宽容的心态和开放的胸襟走进一个多样化的文学世界,既激发广泛的阅读乐趣,又提升体验和理解的品质。

① 杨慧林:《中西“经文辨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以理雅各的中国经典翻译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 史笛文·邦尼卡斯尔:《寻找权威:文学理论概论》,王晓群等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20世纪多种圣经批评共同繁荣的景观启迪人们深思“对话模式”问题。每个人都是透过特定模式看世界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流派为理解文学文本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对话模式。奉行不同模式的批评家皆以一套特殊的关注和意图走进文本,从中找到可资论证其见解的材料;读者进入对话活动时,或许与其对方共享同一模式——这时他自己的见解可望得到认同;抑或与之发生模式冲突,以致遇到沟通和交流的困难——这时应当尝试理解对方的模式,亦使对方认识自己。只讲一种唯独自身明白的话语是无济于事的,要尽力掌握能与他人交流的语言。要擅长在对话中阅读各种文学文本,无论是荷马史诗、圣经、《神曲》、莎士比亚戏剧,还是《论语》或《红楼梦》。各种模式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独到的视角和发现;综合多种模式,有益于达成较为周全而深刻的认知。

富于活力的当代文论大多形成、发展于欧美,随后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这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潮流在当下的延伸。从某种意义上说,运用多种西方理论解读一部出自东方犹太民族的圣经,本身就是一种“西学东用”的学术实践。本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信念,当代中国学者积极引进国外理论,在不少领域推动了中国经学研究的深入。例如80年代以后西方叙事学传入国内,一批学人参考国外叙事理论著作,结合本土的叙事研究方法,对中国的叙事性经典做出新颖解读。王靖宇对《左传》、《国语》、《史记》的材料取舍方式和叙述视角加以探讨,提出“图画式”和“音乐式”两种释读法<sup>①</sup>;潘万木等将《左传》中的预言区分为“直觉的经验的预言”和“技术的知识的预言”<sup>②</sup>;韩猛就时间定位、

---

① 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② 潘万木、黄永林:《〈左传〉之预言叙述模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叙述顺序等对《左传》的叙事时间技巧加以梳理<sup>①</sup>；陈志宏以其博士论文对《左传》的叙事文本、叙事方法和叙事观念做出全方位剖析。<sup>②</sup>海外理论的引进充实丰富了中国传统叙事学，推动中国经学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

又如中国学者对海外神话学的大力借鉴。“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是诞生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20世纪的交叉学科，由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多学科视角的研究会通而成。早在20世纪初期，该学科的“神话”概念就传入中国，催生了文学领域的中国神话探索热潮和史学领域的神话传说时代研究。为了配合21世纪初的国家重大文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叶舒宪领衔倡导“比较神话学视野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致力于探讨三方面问题：比较神话学的文明起源研究、中国神话学反思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华文明发生史的比较神话学研究。<sup>③</sup>在积极借鉴海外理论研究中国经典方面，叶舒宪等人已取得显著成绩，相信他们会更上一层楼。

进而，笔者还奢望本课题能推动中外经学之间的对话，在古代经典的跨越性考察中不断发现各种经典的新颖含义。20世纪圣经研究的重大变革之一是引进比较文学视域，超越单一文本而进行“跨文本诠释”(Cross-textual Hermeneutics)。“文本”不仅指成文的文化经典、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还指口传的阐释及非文字的社会处境、政治经济状况，以及人的生命体验。在李炽昌看来，中国基督徒便处于两类文本之中，一是圣经的经文、故事、观念及其衍生出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二是由儒、释、道等东方宗教文化融会而成的中国思想传统。跨文本诠释不但要将这两种文本置于一处，还要“从一个文本的角度去观照另一个文本，从相遇、相交中发现

① 韩猛：《〈左传〉叙事的时间观念浅析》，《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陈志宏：《〈左传〉的叙事与解释》，台北：国立成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③ 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比较神话学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新的意义,那是阅读单一文本时所找不到的观点与意义”。其间的阐释活动须从两种文本出发,进行多次往返的跨越,不仅做比较研究,而且达到某种转化(transformation)和丰裕(enrichedness)。那种阐释能伴随着一种生命提升及自我发现的过程,既使本土经典成为生命的泉源,亦使阐释者的生命力更具处境化特征。<sup>①</sup>

中外经学比较研究向来为学术界所关注。比如李岗认为,释经学和训诂学分别是西方和中国的经典阐释系统,二者在含义、缘起、方法、传统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演变的路径也相去甚远。<sup>②</sup>孔许友的考察表明,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释经学分别是中西古典阐释学的主体,各有其悠久的发展历史;二者在文本性质、释经态度、释经方式、释经原则、社会功能、与权力话语的关系、意义建构方式、文化影响、学术命运等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和可比性;二者的比较研究对于清理和转换中国古典学术资源并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深远意义。<sup>③</sup>进行中外经学比较研究,意在借鉴西方释经学及其阐释学,最终构建起中国自身的理论体系,以推动中国的经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那种理论体系既应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又应具备普遍的科学价值,能用于对世界多种民族经典的有效研究和深入分析。

作者梁工,河南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近期发表论文《冲突与和谐:希腊神话与希伯来族长传说之家庭观念的歧异性》(《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4期)、《圣经形式批评综论》(《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4期)等。

- 
- ① 李炽昌:《亚洲处境与圣经诠释·导言》,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5—7页。
  - ② 李岗:《基督教释经学与中国训诂学的几点比较》,《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3期。
  - ③ 孔许友:《中国古代经学与西方释经学发展概略及比较》,《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